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5月1日 (第236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在中东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

美国没有必要将中国视为在中东的对手，在必要时也应寻求与中国在该地区展开合作。

中美关系

美媒称美应制定贸易战略以与中国竞争

美国 CNBC 网站近日载文称，中国正与世界各地谈判贸易和投资协议并制定标准，而拜登政府却缺乏一致性和行动力来推进其贸易议程。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的努力中一个最大的漏洞是缺乏一项国际贸易战略。正当中国加大努力在世界各地协商多边和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之际，共和党和民主党却对这些协议很敏感。

到 2018 年，世界上 90 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是与美国贸易的两倍。到 2019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潜台词是，中国市场如此之大，流动性如此之强，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都无法抗拒它的拥抱。

如果没有一项现代的、前瞻性的贸易战略，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能力会大为削弱。问题在于，虽然现在国会两党对于应对中国挑战的紧迫性达成共识，但两党对各类多边和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很敏感。华盛顿缺乏替代选项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两党内的错误叙事，即全球化对美国利益和就业不利。拜登政府应推动一项连贯的贸易议程，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

AEI：美应制定短期战略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

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网站 4 月 21 日登载该智库访问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 (Eric Sayers) 的文章《现在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建议五角大楼、国会和白宫制定一项短期战略，以在

2025 年有效威慑解放军。

文章称，近年来，美国国防部的规划者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将在 21 世纪 30 年代对美国构成的军事挑战。但若仅着眼于应对中国在 2035 年带来的军事困境，华盛顿可能会陷入“时间规划陷阱”。五角大楼、国会议员和白宫需要更好的战略和更有针对性的资金，以在 2025 年有效威慑解放军。

该战略不必寻求美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任何领域都占主导地位，而应继续致力于部署兵力以阻止北京实现其作战和政治目标。解放军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对数量相对较少的大型基地的依赖是一个弱点，并加强了对精准打击能力的投资。因此，美国在投资应对未来的作战挑战的同时，在中短期增强军力的最佳方式是围绕基地态势和主要军种的任务领域（如进攻）建立分层的多领域部队。首先，美国应建立更加分散的兵力态势，以确保关键兵力能继续作战，并为应对各种前景和政治军事挑战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其次，五角大楼应该考虑增加不同军种和在不同地域的打击选择。

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应改变五角大楼对将在 21 世纪 30 年代面临的作战挑战过于单一的关注。为实现这一转变，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领导层需要为各军种、联合参谋部和印太司令部制定明确的方向，并与国会合作，确保未来几年为“太平洋威慑计划”提供稳定的资金。

美专家谈中美教育交流的未来

布鲁金斯学会 4 月 12 日邀请多位各界专家，就中美教育交流的现状、对美国的影响和此类项目的未来发展方向展开讨论。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教育在中美关系不稳定时期仍

然能对两国产生持久的影响。如今，大量中国学生因为美国大学在世界领先的教育质量和声誉来到美国求学，认为中国政府把学生送到美国学习科学是为了“窃取”机密技术是在扭曲现实。中美教育基金会创始主席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指出，美国通过教育交流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并从中获益颇多。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也将教育交流视作重要的软实力输出渠道。如果中国学生未来更多流向其他国家，美国会错失可以影响中国下一代的机会，这也会削弱美国大学系统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美国教育理事会主席泰德·米切尔（Ted Mitchell）认为，学术交流的增长不应受国界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中美间的学术交流应该更多关注如何鼓励自由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和国际合作。同时，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关系需要更加透明。

前美国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Richard Stengel）认为，美国应该恢复富布赖特项目，教育交流项目是美国的一大战略优势，中国近年来在公共外交与“软实力”上有很大支出，美国不能在这方面落后。

美学者：在中东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

并非中国在中东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必要时也应寻求与中国在该地区展开合作。

美国 War on the Rocks 网站近日登载兰德公司国防分析师阿什利·罗德斯（Ashley Rhoades）等的文章称，并非中国在中东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必要时也应寻求与中国在该地区展开合作。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和伊朗近期签署了一项全面合作协议，中国承诺增加对

伊朗各领域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换取稳定的石油供应。由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愈发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很多人认为这项协议会威胁美国的利益。但是，无论规模有多大，中国在伊朗的大规模投资并不预示着所谓“中国—伊朗轴心”的形成。美国没有必要将中国视为在中东的对手。有时，美国甚至会发现其与中国在该地区存在重叠的利益，因为遏制冲突和不稳定关乎两国的利益。

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在中东的参与一直在稳步增加，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也可能促进了中伊关系。但是，伊朗只是中国在中东更大利益的一部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面临着一些硬性限制。譬如，中国必须平衡与多个意见相左的国家的关系，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以色列。

并非中国在中东的所有经济投资都应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担忧。与其把精力和稀缺的资源浪费在不切实际的目标上，如试图把中国“赶出”该地区，美国倒不如试着减轻中国参与的“负面”影响，重新平衡自己在这领域的投资。

即使在其他地区有竞争，美国也可能在该地区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机会。譬如，美中两国可以就在中东推进不扩散目标展开合作。同样，两个国家都没有兴趣延长中东地区破坏性的内战，或允许可能扰乱全球航运的海上冲突升级。人道主义援助、救灾行动和反海盗巡逻也为两国提供了在中东地区合作的机会。鉴于中国担忧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其海外侨民和投资，两国甚至在该地区的反恐中存在合作空间。

美学者鼓吹用“遏制”战略应对中国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4 月 23 日登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杰出教授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 的文章《为

什么遏制可以阻止中国威胁》称，在面临中国竞争的当下，重新审视遏制政策变得尤为必要。

文章认为，遏制战略是迄今为止美国将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结合得最好的战略。遏制的意识形态层面至关重要：如果不强调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策永远不会得到公众和盟友的持续支持。另一方面，成功的外交将遵循而不是先于实力。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确实以某种外交解决方式告终——苏联在几乎所有争议问题上通过谈判投降。但那次和解发生在长期竞争之后，而不是之前。

今天的美中竞争和冷战之间存在很多差异。现在的中国深刻融入全球经济，而冷战时的苏联却与全球经济隔绝。美中竞争的一些重要方面，譬如拥有海量数字数据的价值以及对全球通信网络的争夺，都与冷战时期的争夺明显不同。然而，美国再次与一个强大的“威权”对手展开一场危险的、旷日持久的竞争，美国必须再次制定一项战略，使自身通过这一考验。

今天，美中竞争是在一个远没有 1945 年那么破碎的世界背景下进行的。如果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会比冷战时容易得多，在道德上也更干净是愚蠢的。不能保证美国能够复制遏制苏联的举措来对付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比苏联更有活力。但是，中国也的确面临很多内部和地缘政治挑战。

最成功的策略在当时看起来并不总是赢家。事后看来，遏制从未获得它应得的尊重，主要是因为它似乎将永久的危险与永久的犹豫不决融为一体。它将战略目标与战略耐心结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避免灾难性撤退和灾难性升级的可能性。事实上，遏制战略因为过于软弱遭到一些人的抨击，又因为过于挑衅而遭到另一些人的抨击。这一事实可能表明，遏制达到了正确的平衡。遏制等中间策略本质上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在长期竞争

中，战争和绥靖的代价都是可怕的，一个将力量与清醒、雄心与平静相结合的战略才是正确的方法。

美国外交

美官员称美城市和州应在外交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4 月 19 日登载洛杉矶市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市长、前美国驻东盟大使贺琪珍（Nina Hachigian）的文章称，美国城市和州应该在外交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章称，如果说存在“拜登主义”，那么它的一个基本要素将是打破外交和国内政策的藩篱。国内外政策紧密相连的原因很简单，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取决于其国内经济、制度、人员和思想的力量。

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美国州、城市和社区在对外政策中作用的讨论仍然缺乏。城市和州在基础设施、创新和其他领域的经济政策选择创造了美国力量所依赖的经济实力。当地方政府通过教育、医疗、住房和其他基本需求对其居民进行投资时，它们正在为外交政策的成功奠定国内基础。

州和地方政府与美国境外的互动方式较过去大幅增加。当跨国威胁袭击美国边境时，地方领导人事实上是“地面部队”，他们制定应对流行病的规则，分发疫苗，应对极端天气，照顾移民。州和地方在外交政策中的直接作用也在增长。例如，美国地方领导人经常培养与外国政府的关系。这些关系虽不能定义国家关系的轮廓，但地方关系的总和是至关重要的稳定器。

在拜登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的城市和州可以做得更多。首先，在气候政策上，拜登团队可以推动美国和全球城市参加即将在英

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其次，请来自美国城市的专家作为国际发展的技术顾问。最后，拜登政府可以与城市和社区学院合作，激励新一代年轻人投身国际关系、行政管理和商业领域。

兰德公司为美评估“灰色地带”侵略制定框架

兰德公司网站近日载文称，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美国的挑战者和对手越来越多地希望通过“灰色地带”活动来获得竞争优势，阻止“灰色地带”侵略比阻止国家间的侵略难度更大。

报告认为，“灰色地带”行动有八个核心特征：未触及军事反应的临界点；逐渐展开；不可归咎；寻找法律和政治借口；仅威胁次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国家的支持；主要使用非军事工具；利用目标国家和社会的弱点和脆弱性。

报告还提出了一个评估“灰色地带”威慑状况的框架，确定了阻止高端(更激进的)“灰色地带”活动的标准。遏制高端“灰色地带”侵略的八类一般标准包括：侵略者动机的强度；侵略者所扮演的角色；侵略水平；美国和伙伴在不可接受结果上的结盟；美国和伙伴在威慑反应上的结盟；美国和合作伙伴有相应的反应能力；区域和全球对威慑的支持；侵略者对有意义的回应的预期。

报告最后向美国及其盟友提出建议：保持地区存在和态势在传达对侵略的可能反应、重申其可信性等方面作用重大；明确声明对具体行动的共同意图至关重要；美国响应的主要优势将是培训、咨询、安全援助和军售；特种部队的能力可以为“灰色地带”的突发事件提供重要的、量身定制的政策选择；意识是反应的关键，它放大了情报、监视和侦察的重要性；整合多种力量工具应对“灰色地带”威慑也至关重要。

美专家为美引领亚太地区数据治理建言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高级副总裁马修·古德曼 (Matthew P. Goodman) 等人执笔的报告称, 拜登政府在 2021 年有机会塑造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数据治理倡议。报告向拜登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让美国的数据治理机构恢复秩序。为了彰显美国在推动全球数据治理规则、标准和规范等方面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拜登政府首先需要在国内推动一系列立法、政策和组织变革。其中一个重点是制定联邦隐私立法, 这将降低美国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复杂性, 并提高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海外信誉。拜登政府还需更好地进行协调, 以克服政治障碍, 制定一项包含美国偏好的数据原则的统一战略, 并制定行动计划在国际上推动这些原则。

第二, 让数据治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的核心。美国应承诺参与地区经济合作, 推动美国偏好的数据原则和规范。白宫应努力在今年 11 月的亚太峰会上宣布一项重大数据治理倡议。

第三, 推进全球数据治理机制。美国可以在其在亚太地区努力的基础上, 在全球促进数据治理机制的发展。应该利用现有和未来的国际经济合作新论坛, 把亚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聚集在一起, 推动在数据治理方面达成全球共识。

美智库提美非商业交往的优先事项

大西洋理事会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 拜登政府应考虑进一步将非洲国家纳入美国更广泛的外交政策中, 承认非洲在美国优先事项中的等级日益上升。

报告称, 美非重新接触有三大支柱: 商业机会, 气候和绿色

增长，以及人文联系。一项强有力的非洲政策将优先考虑商业接触，努力调动气候资金，并推动加强人文关系的项目。报告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对现有项目和工具“双倍下注”。拜登政府开始从商业角度使用更多工具和项目，有了这个基础，政府现在需要集中精力实施和加强一系列计划和工具。首先是与国会合作，充分落实 2018 年通过的《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BUILD)。在第一年，美国政府还应优先为“繁荣非洲”倡议铺设强有力的前进道路。

二是落实拜登气候融资领导计划。通过签署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拜登政府已委派国务院、财政部和总统气候特使制定计划，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流动。美国的计划应该包括三个要素：扩大对气候基金的捐款，探索“气候债务”互惠信贷，在美国国际金融开发公司任命一名气候融资主管。

三是推出“旗舰”计划。这包括启动一个“商业团”，派遣年轻的美国人和退休志愿者到新兴市场工作，以减免学生债务、提供少量津贴和有意义的工作；在非洲国家任命名誉领事，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公民外交形式，特别适合非洲市场；参考在非营商总统顾问委员，为创意产业建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报告称，加强与非洲接触，将促使拜登政府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商业和人文联系，造福美国企业，促进美国利益，并推动应对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这种与非洲国家在更多方面更微妙的接触，将为更强大的美非伙伴关系奠定基础，支持相互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执政百日，拜登以何种方式与世界打交道？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主席约翰·艾伦(John R.

Allen)等人的文章，分析了拜登执政近百日来采取的对外政策。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的“百日新政”接近尾声，可以说拜登的世界观与特朗普及其“美国优先”的口号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拜登政府的早期行动类似于奥巴马政府早期那种关注解决方案的乐观主义，但更强调美国外交事务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拜登总统“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论点，即将国内经济复苏作为美国海外行动的首要任务，直接印证了这一观点。它还强调了国内政治考量和意见是如何推动拜登总统的政策目标的，这是迄今为止的另一个关键主题。

在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可以找到一个正在形成的“拜登主义”。迄今为止，没有哪份文件能更好地概括拜登的世界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能轨迹。的确，这份文件试图预告政府的战略愿景，但有两句话很突出：一是“为了在全球促进美国的利益，我们将在国防和负责任地使用军队方面做出明智而有纪律的选择，同时将外交提升为我们的首要手段”；二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在国外的力量要求我们在国内更好地进行重建”。

在很多方面，这些文字定义了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拜登主义”。这份文件还详细阐述了拜登政府的愿望，即重振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与其他盟友和伙伴一道在世界各地强化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并对抗“既带来危险又带来希望的技术革命”。

尽管时间还早，但拜登政府已经在几项竞选承诺上采取了果断行动，并在临时指南中明确表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公开表示支持北约。

此外，在上任的头 100 天里，拜登还任命了一些与他的观点一致的官员，这些人都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这些人招募的团

队迄今已显示出类似的专业水平。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人负责实际执行美国的主要政策决定。

除了这些重要的早期观察，还有一个问题是拜登政府世界观的核心。拜登政府几乎肯定会尽其所能加强多边关系和国际机制，至少向美国盟友保证，美国将重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拜登迫切希望通过聚焦美国国内繁荣的外交政策来“证明”其在国内的合法性。白宫迫切需要证明国内外的唱反调者是错的，而美国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全球参与者的运作能力有赖于此。

虽然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明天会有什么挑战，但可以断言，拜登政府这种以解决方案为重点的多边世界观将在今后艰难的岁月中继续存在。

美国政治/其他

皮尤：两党在枪支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

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就枪支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两党在枪支问题上的分歧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扩大。调查主要发现如下：

略过半数的美国成年人（53%）认为，枪支法应比现在更严格；约三分之一（32%）的人认为，目前的枪支法是合适的；14%的人则认为应有所松动。相比 2019 年 9 月的 60%，认为枪支法应该更严格的受访者比例有所下降。

对于控枪的态度，81%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支持严格控枪，但只有 20%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人持相同意见。同样，虽然近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73%）表示，加大合法获取枪支的难度将减少大规模枪击事件，只有 20%的共和党人

这样认为。大多数共和党人（65%）认为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对枪支管控法律的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大多数女性（58%）认为枪支法应该更加严格，而男性中这一比例为 48%。大多数黑人成年人（75%）、亚裔成年人（72%）和拉丁裔成年人（65%）认为枪支法应该更加严格，而白人成年人中只有 45%的人持该观点。

总体来说，城市居民和少数族裔更加担忧枪支暴力。近三分之二的城市地区受访者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郊区居民（47%）和农村居民（35%）中，这一比例相对较低。超过八成的黑人（82%）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相比之下，近六成拉丁裔成年人（58%）和约四成白人成年人（39%）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应更关注国内问题而非国外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4 月 24 日登载美国西点军校军事历史学者大卫·乔（David V. Gioe）的文章称，美国对国外真实和感知到的威胁的关注导致美国无意识地忽视了国内固有的威胁。

文章称，这种战略分心倾向于解决外国威胁和国内具有外国色彩的威胁，给国内极端主义留下了不受约束的广阔空间。这种边缘意识形态、虚假信息 and 国内政治气候中酝酿的不满情绪在今年 1 月 6 日国会暴乱中达到了顶峰。

美国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始终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的国家，同时又把自己看作是对维护全球稳定承担重要责任的国家。这削弱了它在国内进行反思的能力。从本质上来说，对提供“共同防御”的宽泛理解已经超过了促进“普遍福利”和确保“国内安宁”的

重要性。不断追寻外国安全威胁占用了美国巨大的资源，也使美国承担了不切实际的防务义务，扰乱了地区力量平衡，激起了当地的怨恨，这使美国更加不安全。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复杂。美国人需要更好思考世界并作为世界的一员行事。鉴于美国忽视教育系统的机会成本，以及美国公民对全球化和数字时代带来的巨大经济转变准备不足，美国对国外冒险的痴迷颠倒了美国的优先事项。

许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改善。2007 至 2011 年，美国的财富和经济流动性差距已经在扩大。除了纯粹的经济困难，美国还存在着被压抑的愤怒。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抱怨政府没有“看到”或“听到”他们。这表明政府的政策并未引起公众的共鸣。

由于特朗普政府后期给美国造成的创伤，拜登政府上台似乎有了一个将弥合国家分裂与重置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有利时机。美国需要的不是重置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是自我更新。美国需要通过良好的治理和信任来赢得公民的认可。

民调分析拜登上任百日的支持率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4 月 22 日登载该智库治理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 (William A. Galston) 的文章《执政百日之际，拜登总统在哪些方面赢得了民心？》称，拜登目前受到民众的认可，但也遭遇了一些质疑，未来可能经历更大的危机。文章摘要如下：

从大多数方面来看，拜登开局强劲，其总体工作支持率稳定在 53%，反对率则稳定在 41% 左右。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72%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生产和分发新冠肺炎疫苗给予了很高评价，

67%的人赞同他签署的《新冠病毒援助法案》。拜登提出的“美国就业计划”获得了公众坚实但并非压倒性的支持。当公众得知该计划将通过向企业和富人增税来提供资金时，对该计划的支持率有所增加。

拜登的个人品质也得到了很高评价。皮尤研究中心发现，46%的美国人喜欢他作为总统的行为方式，只有27%的人不喜欢他的行为。拜登在具有同理心方面得分最高，昆尼皮亚克大学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8%的人认为拜登关心像他们一样的普通美国人。

拜登还在民主党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盖洛普民调发现，96%的民主党人认可他的工作表现。蒙茅斯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总体来说，4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一比例是十多年来最高的。

但也存在一些不太乐观的方面。党派团结的另一面是两党分裂。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拜登的支持率差距达到创纪录的86个百分点。拜登也是近几十年来民调历史中唯一一个获得不足半数美国白人支持的总统。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拜登在白人工薪阶层中的支持仍大多来自35岁左右的选民，他在西班牙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仅为50%。

最后是拜登面临的危机。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自去年6月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非法移民视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比例从28%上升到48%。面对日益加剧的担忧，公众对拜登处理美国南部边境局势的支持率只有29%，反对率则高达55%。拜登政府应努力提出一项能赢得公众信心的移民战略。

美学者称美正脱离全球经济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网站4月19日登载该

智库高级研究员西蒙·扬科夫（Simeon Djankov）的文章称，根据核心的衡量标准，如跨境商品与服务流动、资本流动和移民等，美国脱离全球化的程度很显著，尤其是与其他大型高收入民主国家的总体趋势相比。主要表现有：

第一，美国的贸易开放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衡量一个国家贸易开放程度的一个常用指标是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比重越大，一国融入国际贸易的程度就越高。美国曾被视为推动全球贸易开放的力量，现在却落后于国际贸易扩张。全球贸易从 1990 年占世界 GDP 的 38.8% 增加到 2008 年的 60.8%。然而，美国并没有跟上这一趋势。贸易占美国 GDP 的比重上升得比其他国家慢，从 1990 年的 19.8% 上升到 2008 年的 29.9%。全球贸易占世界 GDP 的比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幅下降，但此后缓慢恢复。贸易占美国 GDP 的比重也大幅下降，但在短暂反弹后继续下降。这种下降使全球和美国贸易开放的差距在 2019 年扩大到 34 个百分点，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差距。美国不仅落后于国际贸易扩张的总体趋势，也落后于其他大型发达经济体的上升趋势。美国是过去五年中唯一一个扩大了与世界贸易差距的主要发达经济体。

第二，自 2000 年以来，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停滞不前。2019 年，流入美国的净外国直接投资比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低了 12%，从 2008 年的 3180 亿美元（占 GDP 的 2.2%）降至 2019 年的 2820 亿美元（占 GDP 的 1.3%）。此外，尽管美国对外及全球总“绿地投资”呈增长趋势，但美国接受的“绿地投资”由 2000 年的 130 亿美元下降到 2019 年的 40 亿美元。

第三，近几十年来，美国移民人口增长一直在放缓。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移民人口的年增长率在过去 30 年基本保持稳定。然而，自 2000 年代以来，美国外国出生人口增长一直在下降，平

均年增长在 2000-06 年间下降至 3.2%，2006-15 年下降并稳定在 1.6%，2015-19 年进一步下降至 0.9%。移民的下降趋势在特朗普 2017 年上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第四，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制造业就业在美国非农就业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下降，从 1980 年的平均 20.7% 降至 2019 年的 8.5%。不过，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贸易逆差造成的。事实上，所有高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都在稳步下降，即使是那些出口部门强劲的经济体。

一些批评者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归咎于全球化，和将制造业工厂和就业外包给国外低工资地区。然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更大，如更多利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消费需求的变化也影响了制造业就业，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将更多收入花费在购买服务而非制造业产品上。

第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先是下降，然后稳定在较低水平，美国亦如此。从 1980 年到 2019 年，美国劳动占 GDP 的份额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这种整体的下降趋势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国际贸易和离岸外包的影响、固定资本的加快贬值和向无形资本的转移、经济的繁荣—萧条周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工人议价能力的削弱、巨头公司的崛起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美国，经济集中度的提高和活力的减弱，导致了不平等加剧和工资停滞。美国开放性倒退没有阻止，反而可能加剧了这种集中，而美国巨头公司未能惠及低收入工人。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